

《老河口文史资料》第十七辑目录

辛亥首义鄂西北光复前后·····	刘鸣冈	(1)
老河口的形成与发展史略·····	龚士鼎	(19)
解放前老河口电影业发展概况·····	王连根	(29)
四维小学编训童子年及其他·····	宽 敏	(33)
日寇轰炸宝麟寺纪实·····	谢正廷	(43)
抗日战争时期老河口遭受日寇飞机轰炸的几 则详细报导·····	申楚英	(46)
张集农场简史·····	张宝绪	(51)
洪益奎与蔡筱楼轶事·····	姚学喜	(54)
关于老河口“一贯道”活动情况点滴介绍·····	韩启超	(61)

辛亥首义，鄂西北光复前后

刘 鸣 冈

辛亥革命，已过去七十多年了。七十多年来，撰述武昌首义经过的文章颇多，但记述光复鄂西北经过的资料嫌少，或者零乱。我本想在这方面作些探索，因种种缘故，未能为愿。近年来，由于工作原因，接触了点这方面的资料，作了点粗糙整理，写成此文。

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在于推翻了腐朽的清朝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关于此，历史已作了公正评价，不赘述。

作为鄂西北政治中心的襄阳，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自东汉刘表、曹魏以后的统治者均设首府于此，以管辖邻近各县。清末虽未设道，但此地却有兵备道衙门，以节制襄郧两府。由于统治严厉，襄阳光复就远去武昌首义五十天之久。但一向具有革命光荣传统的鄂西北人民，终于推翻了清朝的腐朽统治。

追记历史事件，本应“记而不作，叙而不议”，但为了弄清事件本末、是非，适当地作一评议，看来并非“画蛇添足”。

为了说清鄂西北光复经过，必须交代一下这一带光复以前的时代和社会背景。

第一、辛亥革命前鄂西北的社会情况

一、帝国主义的恣意侵略

远在两百多年前的公元1731年(清雍正九年)，帝国主义便利用传教的名义，在谷城沈家垭子建立了天主堂。该堂并成为全国天主教的中心教堂之一。下辖五个本堂区，二十一个会口，有教徒三千七百人。1899年建立的“圣心堂”，是鄂西北天主教的领导核心。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帝国主义在中国重新划分教区，意大利宗教势力侵入老河口后，此地即成为一个教区的中心，辖襄阳、郧阳两府十一个州、县的天主教堂。大堂在老河口，设主教一人；各县天主堂有神甫一人，归大堂节制。

帝国主义分子以传教名义，对鄂西北人民进行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

在经济侵略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天主堂在光化王府州和谷城仙人渡、张集、沈家垭子一带占有土地一万亩以上。天主堂包揽词讼，左右官府，廉价收购打官司人的土地，老河口仁义街、线子街等处，百分之八十的地皮被天主堂占有。光绪年间，天主堂的管帐徐马弟，一年之内就为天主堂廉价收购地皮一百多亩。

2、放高利贷

老河口天主堂的利息是，每四月一转，利上加利。特别是引诱有家产而未成年的继承人借债，规定户主去世时，家产归天主堂所有，弄得不少人家破人亡。基督教传教士劳格物，专放高利贷给商号。老河口第一家大绸缎店“仁义信”，因还不起高利贷，弄得经理唐凤山倾家荡产。

3、收购土特产

辛丑（1901年）条约后，日本商人也来到了老河口，以高一倍的价格，深入到生漆产地收购。民族资本家与之争购，每担生漆由纹银24两涨到144两，但运到汉口后每担只能卖70两，蚀本一半有余，而日商却载运回国，民族资本家叫苦不迭。

4、倾销洋货

辛丑以前，襄樊地区的洋纱、洋布，只占当地销售量的20%。自此以后，洋纱大量流进，土布日趋没落。“太古”、“德士古”、“亚细亚”的煤油获利之大，令人咋舌。英美烟草公司的纸烟，遍地皆是，洋货充斥市场，国货遭受打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产阶级社会最平常的现象是——商品交换。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所谓商品交易，是掠夺中国人民的一种手段，激起了我国广大人民的不满和抗争。

在文化侵略方面，主要是办学校，教授圣经，宣扬天主耶稣是救世主，用以束缚人们思想。早在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美国人兰大法就在襄城设鸿恩会总堂；次年，挪威传教士赛发德、沙玛在老河口修建教堂，邻近各县也相继建教堂、办学校。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北京，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割地赔款，签订了种种不平等条约，陷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正为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由此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在鄂西北的侵略行为是与侵入我国其他地区一样，是要任意宰割中国人民，永远遭受他们的奴役。

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的矛盾。”我国百分之一二十的地主、富农分子占有了百分之七八十的土地；而百分之七八十的贫苦农民则少地或无地，终日不得温饱。鄂西北地区农民也是如此。襄阳杨家占有土地四千亩；刘公叔伯四房占有土地一万二、三千亩；枣阳王元兴占有土地近万亩；谷城“刘青天”占有土地三千亩；庙滩陈惠生有良田两千多亩；均县“八大家”的首户苏清泉占有田地三、四千亩。他们利用课租（地主的八成，佃农得两成），大放高利贷（利率为本金的二至三倍），开钱庄，作生意。杨家大房、二房除开了钱庄、发行票证外，还经营油坊、木厂、漆行，获利甚巨。

“均、光、谷三县联防司令”余锡珍就是靠为日本人买办生漆发财的。这些地主阶级利用剥削农民来的钱去捐官，再来压榨老百姓。苏清泉捐过工部侍郎（中央的副部长级）；杨广溪捐过道台（辖两个以上的府）；杨老九捐过知县。这样，贫苦人民就遭受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压迫，再加上各种苛捐杂税，真是苦不堪言。

三、鄂西北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

两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迫使贫苦大众不得不起来与之斗争。

据襄阳、光化、谷城等县县志记载：在清嘉庆元年（1799年）襄阳白莲教领袖王聪儿（齐王氏）、张汉朝等起事，直至八、九年始平息。咸丰七年（1856年）又爆发了红巾军起义。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襄阳县令李祖荫领导人民砸烂了福音堂与邮电局。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以“扫清灭洋”为斗

争口号的老河口江湖会领袖孙明喜、柯了凡事泄被杀。光绪二十九年，老河口仁义街赵一贯仗势欺人，被群众打破玻璃窗。光绪三十一年，老河口城乡群众因不满官府限制食盐开放，捣毁盐局，领导人徐子常被官府杀害。

综此，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主义相结合，想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但是，一向具有抗争精神的鄂西北人民，为了反抗剥削和压迫，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是势所必然的了。

第二、江湖与起义军

董必武同志说过，在襄阳，响应武昌起义，率先倒清的是清军中少数倒戈的士兵和广大江湖会会员。据此，将光谷鄂西北的主力军——江湖会组织作一简介。

辛亥革命前后，江湖会在鄂西北一带很活跃。他们就是民间通常称的哥老会、洪（红）帮、洪（红）门。红帮起源于明末。其革命宗旨是“兴汉灭满”，恢复汉族江山。入会兄弟一切行动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为办事原则。尤其讲义气。以刘关张三结义和梁山好汉为学习榜样。因为他们讲江湖义气，所以一般人称之为“江湖会”。在清朝统治年代，他们的活动是绝对秘密的。介绍人是：一引进、二诚心、三保管。当引进的一般兄弟都可以，但做诚心和保管的却一定是红帮的当家老三。入会时，得在香堂发誓、砍红香、喝雄鸡血酒，“照心”后才算正式入会。

江湖会的最高首领为龙头。龙头以下为大哥。大哥中以坐堂大哥为最尊，权力也最大。坐堂大哥分坐、陪、刑、制、礼各级。较次的有“权衡”、“护简”、“明证”、“香长”等大哥。此外还有“心附”、“心遣”二大哥。大哥以下为二哥、三哥。入会的男性排行属一、二、三、五、六、九均为哥，彼

此互称兄弟为尊敬关羽、避讳，二哥空位；入会的女性为四、七，均为姐，相互呼姐妹。排行属八的为僧道；排行最末十，称老么。他们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宣传革命，号召群众。参加红帮的多为市镇上的下层人物以及一些没有一定职业的人。老河口的江湖会首领除了前面说的柯了凡、孙明喜外，尚有坐堂大哥宋有之、刘宪章、周志雄、何义茂等。他们常以华阳楼（光复后改为大汉楼）为聚点，日夜操练武艺，为起义作好准备。起义时已有六、七百刀枪手。

到了起义前（宣统二、三年），驻老河口的清军加入江湖会的也越来越多的。巡稽营中巡防队以及襄阳上下的巡防水师一营的官兵先后参加了江湖会。起义前夕，参加了江湖会的党人号称数千。

辛亥年阴历八、九月之交，枣阳人李秀昂、天门人（后移居汉川）张国荃等十九个马队士兵由枣阳到了老河口，随即与巡防营取得了联系。他们结纳会党，串通盐务缉私队和南阳客军。（客军表示，不参加起义，也不干预革命）。马队驻在罗广发油行，经常在向阳酒楼聚会，巡稽营是他们的活动重点。再就是串通了老河口商团的二、三百人（多是红帮成员）。并与厘金局的号目甘国栋取得了联系，四十个巡警全部参加了起义。

严格些说，这就是起义的主力军。

第三、光复鄂西北经过

襄樊，是鄂西北军事、政治重镇，自古以来即有重兵把守。武昌首义的第四天（10月14日），“府署传出，办写飞札七属，大约云：奉督宪二十一日（阴历八月）电谕，本省革命军勾结土匪，已将汉阳、武昌占据，奉电告面派荫大臣带北兵

来剿，不日即到”，而此时的襄樊两城，市面萧条，“官票不流行，各商纷纷，兑钱，官局不能支，”政府派兵弹压，并请绅商维持。10月19日襄阳城六门紧闭，天大亮开门，黄昏即下锁。柴米飞涨，清官定价。20日，襄樊各钱庄罢市。

官衙惶惶：不可终日，支撑危局五十天。

而在江湖会最活跃的老河口都是另外一番景象。

11月27日，李秀昂、张国奎和江湖会各首领在宝林寺商量起义计划，直至天亮。第二天，是老河口大绅士乾丰钱铺老板曾任老河口商会会长的邢福安娶儿媳，宾客盈门。光化县知县南书南、水师营官带周祥谦、官钱局局长、电根局局长等地方官吏和绅士均前往道贺。正热闹时候，李秀昂、张国奎率马队冲了进去，将全部官员架了起来，强迫他们反正。并押着他们从邢家出发，一路封闭电根局、官钱局。封闭消息，以便进攻襄阳，冻结现金，以备军饷。到了官钱局后，起义军立即开会，首先要管带周祥谦签字顺从革命，然后出城移交部队名册及枪械。但周不服，签名后乘机逃脱，企图抵抗，被李秀昂当场击毙。由于市人心惶惶，起义军出布告、鸣锣安民。大意是：光复汉族，驱逐鞑虏，兴汉灭满，保商保民……并下令剪发，各商店照常营业。起义军到达城外宝林寺，顺利地接编了军队。当周祥谦被击毙后，老河口街上大店铺纷纷闭户。后来听到“兴汉灭满”的宣传，又看到黄书南的轿子挂了白旗，并无意外，于是也打开了门，挂了白旗。

起义军一面安民，一面招兵，在各会馆设招兵处，很快就招募了两千人，编了十个营。兵士每人每天两百铜钱。江湖会首领宋有之、何义茂、甘国栋等任管带或队官，张进香、崔有常等负责老河口自治。

安抚百姓之后，李秀昂等积极进取襄阳。首先将马队中的

红帮弟兄组成了一支敢死队，于起义后的第二天即向襄阳进发；大队人马分水、陆两部沿江而下。水路有炮船八支；陆路有人马两千。李秀昂骑马，黄书南坐轿。途经仰人渡、太平店，抵达襄阳万山。

一贯驻有重兵的襄阳城，此时人数却不足一千。原因是清政府驻军统领刘温玉，为了防止武昌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调张楚材的军队前往安陆阻挠；又调一哨步兵去枣阳镇压武昌返乡学生陈绍嘉领导的农民起义；骑兵营三连分散在光、谷、枣等县。加上马队标统王国栋在首义前已去武昌，无人与刘温玉共商对策。仅有的巡防营步兵三营，分驻在襄城迎旭门、襄阳城内及长门一带；骑兵一营驻襄城火星观；襄阳河下有炮船二十支。这就是全部人马。

与此同时，襄阳的青年学生正积极进行革命活动。

武昌首义后，鄂北学生纷纷返襄。留日的有杨君磐、杨九生叔侄和两湖师范的杨君直、周景占，高商学生马骥之以及邱凤吾、毛伯屏等。他们回襄后，即与东门外的骑兵第八营取得联系，在夜晚将革命标语贴在道台衙门，道府立即命令各校停课。兵备道喜源（满人）和刘温玉等听说学生从武昌携回炸弹，更是惶恐万分。喜源在襄阳光复前一天就被南阳镇台谢宝胜接走了。也就在这一天，在老河口起义的何义茂（一名炳坤，柯了凡的好友），奉张国荃之命，率领数十弟兄潜入樊城，在王锦如家通宵会议，策应起义。

光化起义军到了万山，并未立即攻城。此时万山一带人烟稀少，水陆两部在此会师。稍俟休整，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炮船即轰击襄阳。在几乎未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起义军从小北门爬入城内，人数只有一百多，快枪不过三、四十支。管带孙长龄虽有几百支枪，但不知起义军底细，有些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之感，在城破时就逃跑了。士兵无主，投降了起义军。

1911年11月30日襄阳光复。

正当起义军在李秀昂率领下进城的时候，襄阳团县杨廉溪正在巡防，他看见全城满挂白旗，知大势已去，无法挽回，便进行政治投机，叫团丁周宏彬打开了小北门。此时绅商周宗泽、杨绍楨、杨承恩、李日谦、刘秉鉴等正在刘温玉寓所劝降。刘早无斗志遂令知府曹允源、知县魏仲青打开城门，延请义军入城。而李秀昂等早已入城。

起义军入城后，首先占领了官钱局，接着占领了道台衙门，随即宣布了保商保民、平买平卖的安民政策。起义军的军纪很严，不准拿百姓的东西。樊城巡防营有个水兵拿了人家一双鞋子，李秀昂立即将他正法。先后办了几个坏人，安定了地方秩序。

就在当天，起义军在鼓楼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城内士绅张玉衡、张子琴、杨君谟、黄圣涛、毛伯屏、刘务滋等人。会议选推了黄书南为襄阳军政分府的都督，驻道署；张国荃为司令，驻提轅，军政分府下设书记、参谋、副官、军法、军粮、军需、民政等处，分别由刘鉴三、龚益安、丁光启、罗超群、洪汉杰、杨君直、苏星一、杨廉溪等任书记官或处长。司令部两个协、一个独立骑兵标、一个独立炮兵标、许鸿钧任第一协协统，驻襄阳，李秀昂任第二协协统，驻樊城。共有步枪两千支。

会议期间，由于群众反满情绪高涨，在李秀昂主持下，处决了贪赃枉法的襄阳厘金局委员存厚及其账房。派人至监狱解释了以鄙弃满清科举或密谋革命的“襄郡九贤”，除叶大中已死外，其余八贤均聘为顾问。知府曹允源因有政绩，也被聘为

顾问。

下午，起义军在府衙门前，排上桌子，竖立白旗，令道府官吏前往画押，表示顺从军令。并将隐藏道台喜源的宝丰和广信两大当铺的财物没收充公。由原襄阳府二府知事张隽义（汉谦）接任襄阳县知事。

十二月一日，军政分府令沿街鸣锣，勿闭市，照常营业，清查户口，严禁买卖鸦片，另派调查员至所属各县，劝各富户支纳军饷，提取光化、襄阳各署铜元十一万串，用作军饷，不准向贫民摊现款、物资。

十二月二日，起义军在城隍庙，文庙等处设桌凳、名册，招募新兵，不数日，即达千余。参军的多系贫民。派宋韬为参谋长。

仅数日间，即得一府两县，声威大振。起义军一方面传檄各县举义，一方面驰电武昌军政府报捷。

襄阳光复后，接着光复了襄属各县。

在光复襄阳当夜的十二时，谷城起义军在海凤山的领导下，经过一番秘密会议之后，和尚彦巨率领二百船民、市民、从南门进城，先占领了火药局，缴获了不少武器，然后攻进了县衙门，胁迫知县张肇芳交印留任。随即释放囚犯。在三神殿指挥部决定，令所属部队分驻各重要据点。处决了石花街巡检、赃官王萃奎和冷集大土豪郑贡爷。海凤山被推为军政领袖，招兵后共有四营。襄阳军政分府委海凤山为标统。

据《枣阳县志》载：“辛亥八月，武昌起事，县人闻之，朝夕惶惶。延至十月二十一日（阴历为12月11日），实有民兵数十人，乘夜入城，拥知县瞿长岑至襄阳。遂不折一矢，不遗一镞，而县城告失矣。”枣阳光复前，驻有湖北第八镇马队八标三营一个哨（排）六、七十人，哨官周政戡原和张国荃是同

营兄弟，联系密切。襄阳光复后，周即积极响应，与巡防马队哨官周有山率兵至县衙，逼令知县瞿长岑易帜，终于未动刀枪，全城均悬白旗。

宜城在襄阳光复后，积极酝酿起义。知县吴文炳惶恐，以对襄阳纳款而又不易帜的态度。正当此时，徐汉忠（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说是逃兵）率领三十余人，高树汉帜、赚城而入，”吴走匿民家，仅以身免，”徐等于是占领县城。

南漳武镇积极响应襄阳起义军，推巡防营兰占廷为首领。兰分兵兵为三队：一队留武镇，兰亲率两队直驱县城。时知县夏绍范正忙于防治迎患，措手不及，兰与襄阳马队适至，夏竖旗交印，仍留位。

均州知州陈文琪，接到襄阳军政分府檄文后，“即传谕绅民，竖旗反正，”军政分府派”周鸣岐前往安抚，文琪换印视事。”

以上为襄阳及所属各县光复概况。

第四、黎元洪对起义军的镇压

武昌首义后的湖北都督黎元洪是被迫参加新政府的。他原是清朝驻武昌的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可以说一贯对革命不满。辛亥首义前夕，仍说：“谈革命者，不自今始……如革命党果多，则鄂事难料……。”冯自由在《武昌起义黄克强》一文中说：“八月二日午后，局势大定，蔡济民等以黄克强、宋教仁未至，刘公出汉口狱未渡江，孙武负伤，蒋翊武逃亡，乃强挟黎元洪为都督，借资号召”事实经过，武昌起义发第一枪的熊秉坤说的颇详细，马荣，杨启发等巡至黎宅，“黎初避不见，诚恳再三欲避不得，始出见，谓曰：余带兵十余年，自问待汝

等亦不薄，何与余为难？众曰：吾等原无恶意，请公主持大事耳。黎曰：革命党人才济济、要余何为？马荣曰：时急矣，将从而生乎？抑不从而死乎？统领自择之。曰：要余何往？众以楚望召对，复问系与何人接洽？众曰：与吴兆麟。黎曰：吴君素有声誉、且富军事知识，伊一人足矣，不必强余去，众不听，挟之来……。”张难先亦说：“时预定之都督刘公隔绝在汉（汉口尚未收复），孙武炸伤，总司令蒋翊武出亡，副都督刘英远在京山……。各军领袖，会以资望浅，谦让未遑，仓促不得人选，”就这样，忠实于满清的奴才黎元洪被推上了都督的宝座，进而爬上了副总统、总统的统治地位。

武昌起义新政府组成后，刘公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府总监察部部长，黎元洪深知刘公在革命党人中的威望，不久即撤销总监察部，调刘为北伐左军司令兼河南安抚使，以削弱他的权力。为监视刘公的行动，黎暗派自己的护官王金奎随同刘公赴襄，刘率领两千余人于1912年2月中旬（辛亥腊月底）从武昌动身，在钟祥附近与从樊阳调汉的季雨霖相遇。

季雨霖是荆门人，原任三十一标工营督队官，早年参加革命团体日知会，参加过几次起义、均败，走东北。武昌起义后、回鄂，任标统，后黎元洪派他出任安襄郢荆招讨使，于张国荃，李秀昂等光复襄阳前的十一天（11月19日，阴历9月29日）从汉口出发奔襄阳。在途中，由于汉阳民军失守，无意北上，加之沿途收容游勇，在仙桃镇整军十余日，至沙洋，始知张国荃等已占领襄阳，后又赴沙市，与唐愷友争夺战功与地盘，受到黎元洪的斥责，令其复行北上。12月末，季的军务处处长高仲和（枣阳人）领先锋一营人到襄阳，见张国荃等戒备甚严，不得已只有驻扎樊城。时有不被张国荃等所重用的原陆军中下级军官，前往高仲和处告发张，李等人飞扬跋扈等情事，高仲和

因在襄樊无所作为，于12月末一个午夜悄悄离开樊城，前往枣阳。迨返襄时，季雨霖已于1912年1月23日至襄。季未到襄前，曾派人至襄活动，张国荃不以礼遇，在他设宾馆的昭明台四周，遍设岗哨，名为护卫，实为监视这些人，一时流言蜂起，说他尾大不掉。但后来张感自己人微位卑，如此办法并非良策，所以季雨霖到襄时，“国荃率各界郊迎，宾礼备至”但也打消不了季奉黎元洪之命要改编张国荃部队的决心。

季雨霖要剪除异己，张、李等自恃功高，互相猜疑，彼此戒心日剧，李秀昂枪杀任宏钧，使双方之间的矛盾，趋于白热化。

任宏钧是河南信阳人，原是清军二十一混成协十一标一营炮队士兵，武昌起义时参加民军，在汉阳黑山被袁世凯军所败，逃至襄樊，后参加了张国荃的部队，担任了独立炮兵标标统，他的胞弟是季雨霖的马弁。任宏钧感觉自己不是张、李的起义弟兄，想归附季雨霖。季写信给任宏钧，要他扩大势力，以便改编李秀昂军，偏巧信落入李秀昂手中，这样，李便生为杀任之心，在任宏钧攻克枣阳回襄之际，李秀昂以庆祝凯旋名义，请任吃饭，时已夜深，李秀昂派亲兵守候，当任行至襄阳着妓陶小玉门口时，将任拿获，以嫖妓违犯军纪为名，予以枪决。此事发生在辛亥腊月初三。

腊月二十一日（1912年2月8日），“季便授计于部下阙龙，暗杀李秀昂于市，然后声明其罪”。（张玉衡：“十年见闻录”）。

阙龙，沔阳人，武昌起义有功，升任标统，不久，升迁协统，随季雨霖入襄，具体执行暗杀李秀昂计划的是阙龙的心腹总稽查付汉杰。当时李与阙的部队都在樊城，阙部住余家巷，李部住二府衙门里，李秀昂本人住存厚公馆。付汉杰接到季、

密令后，就派了一排人去刺杀。早饭后，李秀昂从邵家巷检阅部队毕，带了一连人骑马回府。路过余家巷阙部门口时，付汉杰让过李的卫队，从背后用手枪向李秀昂射击，李应声而倒。付将李的尸首拖至余家码头，斩首示众。接着，季雨霖在全城张贴告示，历数李秀昂“北伐逗留不前”、“刻扣军粮数十万”等罪名。

一场镇压起义军的罪行，由此开始。

季雨霖到襄阳不久，以升迁为鱼饵，调谷城起义领袖海风山至樊城。壬子年正月初一，海风山从驻地磁器街山陕会馆过江给襄阳招讨使拜年，回来后又被告去的说要他北伐南阳，但一去就被杀在襄阳四眼井。海风山被杀后，他的部队也被遣散了。

就在同一天，季雨霖指示老河口统领周风声借故杀死了和张国荃一起起义的第三协队官车广床，又杀死张国荃的营管带黄虎山于老河口新街码头；以后被杀或互相杀害的尚有徐凤山、马连山等。

因为南北议和，季雨霖在河南邓县住了几天，于正月初一还襄。班师途中，遥传季要杀张国荃，所以，张一回到襄阳，就躲进了美国人办的同济医院。从此，他的部下更加萎靡不振，不问府治。

不久、季雨霖等调回省，刘公于1912年8月20日（壬子年二月初二）至襄，驻道台衙门，张国荃驻提台衙门。

刘公来襄，所带的人数不多，改编成一个混成协，由原北伐左军总司令部军械处长冯征元任协统，襄阳绅士杨君谟任军法官。

在此以前（辛亥冬腊之交），黎元洪派咸宁李子云到老河口了解张国荃的情况，被张的部队查获，未能如愿。黎再派安

陆人原张彪部下辐重营队官，现王安兰部协统周景亚来襄，以便改编张国荃部队。周至襄时，季雨霖已走，刘公已到，时间约在1912年4月。周末入襄之前，先把大队人马安札在双沟，二十名马弁驻张家湾，到樊城后，又将四名马弁驻在四官殿，自己带一名护兵驻磁器街高升店，便服外出，到处串联。并亲自往见张国荃，出示公函，说明来意。可是不久，张国荃接到妻兄刘兴弟从汉口来电，知道了周来襄的内幕，于是便产生了暗杀周景亚的念头。

壬子年（1912年）端午节，周景亚身着绸长衫，去参加刘公左军标统林鹏飞的宴会。当他路过张国荃的二十二标部门口时，突然有一二十个士兵列队持枪向他致敬，周收下阳伞还礼，不料一枪击中了他的腿，惊走；又一枪，他带伤逃至林家巷码头倒下，追兵砍下他的头，尸身扔至河中。

在襄阳的林鹏飞一听说此事，马上要带兵来打张国荃，但被刘公劝阻。八天以后，正式开火。

六月二十七日（阴历五月十三）夕阳西下时，张国荃的部队查街，至鼓楼，遇上林鹏飞的驻军。林的部下用砖头打张的查街人员，于是双方打了起来。张的部队在南街城楼向鼓楼开炮，林的部队还炮。由于张的部队招的多是新兵，不会打仗，加上张国荃也不想大打，于天将晓时从西门撤走。第二天一早，张的部下王开典从樊城十字街过江来援，知张已走，又回樊。以后与许鸿钧的部队相继离开襄樊。少数未走的本地人，接受了刘公的改编，但不久，也先后离去。

事后有人分析刘、张之冲突，一是由于张不接受刘的改编；二是由于张曾向刘公家庭派过公款，刘有报复之心，但实际上是由于阶级矛盾激化所致。张国荃部队的军饷来自于富户，但未损害过穷人。连当时刘公的部队也说：“张国荃为人很

好，很文明，他为了爱护老百姓，对刘公的进攻未认真抵抗，就退出了襄阳。”而刘公的部队呢？张玉衡在《十年见闻录》中说：“知左军劫居民，多至数百家，至各亲友处一看，皆长叹。”，左军者，刘公的北伐左军也。此事发生在张国荃退出襄阳的二天，6月30日。

张国荃离开襄阳后，回到了老河口，百姓欢迎说：“我们的张国荃又回来了！”张的部队驻抚州会馆，粮饷由商会筹办。他们继续宣传“保商保民”政策。

原来张国荃在襄阳时，因受到季雨霖和刘公的排挤和打击，就有了急流勇退的思想，逃回老河口后，就更加意志消沉了。他曾向人表示要隐居，又说要远走他乡。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经河南转回老家天（门）汉（川）一带，进行护法讨袁活动。不久又转上海，住英租界“同怀栈”，曾令他侄儿张方兴送手枪给在天汉一带搞革命活动的张家富。辛亥首义后的第五年（1916年）黎元洪的包探以三、四千元巨款，贿通租界，将张国荃诱至外国轮船上，在镇江被逮捕，经南京解送北京杀害。《十年见闻录》说：“（九月）初八日（10月17日），张国荃被刘公政走后，越二年在京师被获杀之，见报纸。”而黎元洪的亲信季雨霖，也在“黎（天才。襄郢镇守使）军独立时，杀之于沙洋，见布告。”阙龙也同时被杀。

在张国荃离开老河口后，他的部下秘统王开典率部回老河口，散兵陆续归队，约有一千人，五百支枪。不久，王开典不知去向。由甘国栋遣散了没枪的人，收有枪的人组成了一个暂编队，自任管带。在老河口驻有半年。民国二年（1913年）秋后，黎元洪的亲信，执事官，陆军第三师长枣阳人王安澜派团长王宝泰改编了他们。由于给养无法解决，便接受了改编。民国三年，王安澜将他们调至襄阳，不久，全部遣散。